



军事博览

JUN SHI BO LAN

王林 吉云 朱金 编著

黄河出版社



目 录

一 名 人 天 地

毛泽东决战决胜决乾坤	(1)
淮海战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智力角逐	(5)
彭德怀忆出兵朝鲜内情	(6)
许世友是如何打出少林寺的	(8)
中国的核弹火箭之父	(10)
冯玉祥之子——冯洪达将军近况	(17)
张学良谈“西安事变”内情	(20)
杨虎城不为人知的家庭内幕	(23)
中国最年轻的上将属谁	(25)
中国最年轻的将军是谁	(27)
希特勒之死的真相	(27)
朱可夫元帅被撤职经过	(29)

二 战 争 风 云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纪实	(30)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纪实	(33)
四野:解放海南岛纪实	(37)
1989:美国入侵巴拿马	(43)
1985:以色列空袭巴解总部	(45)
一只手表引发世界大战的内幕	(46)

三 武装窥视

海外评中国的武警部队	(50)
海外评中国的核力量	(52)
海外谈中国飞机的买卖	(52)
世界秘密研制中的最新武器	(56)
评军事强国“所向无敌”的航空母舰	(57)

四 谍海军机

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编制曝光	(64)
中国军事机构编制解密	(68)
揭开台湾总统府侍从室的神秘面纱	(73)
世界保镖种种	(75)
台湾新兴的保镖公司	(77)
神秘的克格勃对外开放	(78)

五 军事要览

中国百万大裁军	(79)
唐乾三胆大惊人:没有经军委批准竟敢下令 拆除歼-6 战斗机生产线	(82)
强征军妓——日本朝鲜引起新争端	(85)
43 起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纪实	(85)
美国的秘密核指挥所	(87)
美国打捞苏联核潜艇秘闻	(88)
以色列突击队勇救人质	(89)
“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沉没记	(91)

一、名人天地

毛泽东决战决胜决乾坤

翻开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纵横八千里，象辽沈、淮海、平津这样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是从未有过的。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面上，几百万军队进行会战，如此复杂，如此激烈，也为中外古今少见。若把这一战略决战比作一篇宏伟壮丽、光照千古的文章，那么，象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这样，在神州大地上，以如此高超纯熟的艺术才能，生花的妙笔，书写出如此丰富多彩、奥妙神奇的妙文，也该是亘古未有的大手笔。

1946年7月，蒋介石自恃手里有400万军队，又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充分”准备，接收了100万日本侵略军的全部武装，再有美国军事、财政上的巨大援助，而解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客观条件下却占“劣势”，所以，蒋介石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完全不顾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和平建国的愿望，撕毁了1946年1月间经过43天艰苦的重庆谈判而签订的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悍然挑起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投入血泊中。

但是战争自有它自己的规律，绝不依蒋的如意算盘而转移。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的优势，解放区的困难，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是反人民性质的，人心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

所以，战争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仅仅一年，便出现了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到1948年6月，解放战争就完全出现了新局面：军事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每况愈下，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其中能作战的170余万人，被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

华北、东北、华东五个孤立的战场上。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在战争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由120万人增加到280余万人，军事、政治素质不断提高，愈战愈强，一年多消灭了敌军100多万人，并依靠蒋介石这个优秀的“运输大队长”，不断武装自己，无论内线作战，还是外线作战，都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不但能打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能打攻城略地的大规模的阵地战，并且已经创造了四平、石家庄这样攻坚战的样板。事实表明，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操在我们的手里。眼下这篇文章如何做，就看毛泽东这位妙手的生花之笔了。

这里有段插叙，值得一提。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蒋介石反顾便挑起内战。在延安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到河边散步，正好遇到美国友人马海德和夫人苏菲。老友相见，非常亲切，便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促膝谈心。马海德向哈尔滨能否保住，毛泽东说：美国帮助蒋介石运兵几十万到东北，要占领所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们也准备让给他，他暂时处于优势。让蒋介石高兴一点，将来消灭他也更容易些。马海德还问：蒋介石一共有多少军队？毛泽东说：他号称500万军队，实际上真正能打仗的只有300万左右。他如果往东北运去100万，还有200万，分布在全国各地。到那时候，蒋介石就没有后方了，他就会发现，他的末日来临了。他想挽救败局也来不及了。这使马海德非常感动，连声说：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看得很远呀。战争的胜利，一定是中共的。

历史正是按毛泽东的预言前进的。到了1948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预言，就全部实现了！

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就象写一篇精妙绝伦的散文，内容复杂，变化多端，首先需要确定这篇文章的主题。有了主题，材料的取舍，布局谋篇，承转关

锁，方法的运用等等，也就易于解决了。

当时面临的形势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又打内战，人民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军事上也有了这种可能，在力量对比上敌人形式上仍占优势的情况下，发展我们节节胜利的形势，组织力量，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已完全可能。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敢于攻击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同敌人强大的机动兵团作战，敢于打我军从未打过的大仗、恶仗，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即这篇雄文的主题：决战！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这一战略决策，妙在抓住时机上，早则不成熟，晚则时不我待。正如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中所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的错误，就是择时不当。”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扑捉战机的无比英明和果断。

主题确定了，文章如何做？话要一句一句地说，文章要一段一段地写，即使有挥笔而就的才能，也无不如此。尤其困难的是开头一段。因为战略决战阶段的斗争，最激烈，最复杂，也最易变化，瞬息万端。也象一盘棋，一着投错，满盘皆输；一步妙棋，也可使满盘活。真是一笔九鼎，一子千钧啊！所以，战略决战之始，首战哪里，就成了决战的方向问题了。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这是指战略上说的。真要打败他，策略上需要一仗一仗地打，而且不得有半点疏忽，尤其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都不同程度地有利于人民解放军，但眼前的决战，第一个战役由何处打起？这就需要“知己知彼”了。毛泽东讲得更透彻更鲜明了：“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的侦察、思索、判断、决心、部署是怎样的呢？

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55万余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通过北宁线锦榆段

与关内水陆联系；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60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上的归绥、张家口，以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地，塘沽港是他们的补给线；太原的军阀阎锡山已被我解放军团团围住。已成瓮中之鳖；华东战场是刘峙集团，60余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连云港，西至高丘的陇海线，以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大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75万余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30余万人，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下败将。被牵制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这5个集团已被我战略包围分割，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这篇自古以来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的雄文，根据敌人这5个集团的特点及其分布状况，确定为三大战区，共分三大段：

1948年9月12日至1948年11月2日，进行了辽沈战役，歼敌47万余人，完全解放东北；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人，使解放长江以北，已成定局；

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31日，进行了平津战役，歼敌52万余人，全部解放了长江以北，并为渡江，解放全中国，建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这位文章大家，运用其妙笔，所写的这篇妙文，真是处处生花，处处生辉，其艺术境界，实在是妙不可言，纵使唐宋八大家再世，也哪里能比得上一二？

首先，在军事力量对比上敌人表面仍处优势的情况下，作出进行战略决战的伟大决策，就气势磅礴，声威夺人，大有排山倒海、不战而胜的气势。其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略，已为世瞩目。

以下仅就几处妙笔，与大家共赏析。

妙笔之一，是首战东北。从政治上看，东北解放区已占97%，实力较强，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敌人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另外敌人曾有“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但蒋介石优柔寡断，举棋不定。首战东北，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如“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等等。在战役上完全有了战必胜的把握。先打东北，也使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成为泡影，同时还避免了我先打华北，则会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真是扬己之长，击敌之短，一石三鸟的妙着。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这一战略方向的确

是何等的英明！其宏图大略，全局在胸，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才能，是何等的惊人！

妙笔之二，是进行东北战役，绝不先打长春，中敌人牵制我军的奸计，而是先打锦州。打下锦州，满盘皆输，所以，毛泽东在1948年9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10月10日，毛泽东又电令林彪、罗荣桓：“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锦州战役的胜利，完全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因锦、榆、唐一线敌人互相孤立，遂使打锦州的攻坚战成为确定可靠。打锦州是击敌要害，所以锦州打响，蒋介石便急忙飞抵沈阳，坐阵督战，甚至锦州已被我解放，蒋介石还下死命令，让廖耀湘夺回锦州。正因为如此，使我“打其必援”的战术又得以实现。攻占锦州，歼敌10万，攻坚打援，又歼敌10万，卫立煌集团就成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囊中之物，我军关门打狗的态势遂成；解放锦州也成了逼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我一举解放沈阳的伏笔。

妙笔之三，辽沈战役于1948年9月12日打响之前，在9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之大歼灭的决心”，而另一方面却命令华东我军避免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并且明确具体地指示，即使歼灭敌人，也不要超过一两个整编师。

这一笔妙在，既可以使蒋介石继续做他的盘踞东北的梦，又可以促使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继续“优柔”下去，直至卫立煌集团的覆灭。如果华东我军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势必促使蒋介石下撤退东北的决心，真的如此，毛泽东把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消灭的构想就不能实现，同时必然使华东敌军得到增援，这样，反倒增加了我们战略决战的困难，从而使整个决战的战局受到影响。历史的发展，确实证明了这一战役决断，不愧为惊世骇俗之笔！

全歼东北之敌卫立煌集团，完全解放东北之后，毛泽东又运用“兵贵神速”、“出敌不意”的原则，接着命令东北我军，不待休整，便秘密入关，可以看作这篇妙文的过渡段。这一军事行动如此神秘，如此迅疾，妙在会同华北我军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但是，毛泽东又命令东北野战军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

妙笔之四，是东北战役还在激烈地进行中，毛泽

东便部署了淮海战役，并把这一战役分作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的重心，就妙在确定“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等地上。因为淮海战场，蒋匪军60余万人，若加上以后增援的1个兵团及其他部队，共80余万人，取“一点两线，重兵密集”的态势，妄图以其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聚集一团，让我“吃不掉，打不烂，歼不了”，并互相策应，守住中原，屏障南京。所以，要战胜他们，必须先行分割包围，使其不能机动灵活，互相迅速增援。所以，毛泽东的战役部署为：以优势兵力，即以2个纵队消灭敌1个师的比列，以6至7个纵队围歼黄伯韬兵团；而以5至6个纵队实行分割、阻援、打援，牵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使其不敢舍命东援等。

歼灭了黄伯韬兵团，首先断刘峙一臂，使其成了独臂将军；而使这山东、苏北解放区联成一片；还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通道，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淮海的态势，刘峙集团陷于四面被围，孤立无援，又无路可逃的绝境。

此后，我军稍松了松套在刘峙脖子上的绞索，缓歼杜聿明，稳住了东北、华北敌军，待东北战役全歼敌人，彻底胜利之后，才紧接着完成了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任务：歼灭了黄维兵团和刘峙亲自指挥的杜聿明集团，又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从而使蒋介石“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幻想彻底破灭，经营了20多年的蒋家王朝已是大厦将倾，土崩瓦解，气数已尽了。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何等的灵活！

毛泽东的辩证思想是何等的完美！

妙笔之五，是淮海战役鏖战正急的时候，毛泽东电令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不要急于攻歼太原之敌，待到东北战役完全胜利，大军入关，淮海战役也已胜利，平津战役业已打响，再对太原之敌实施最后歼灭。这样做的妙处在于，既可以确保淮海战场之敌孤立无援，被我从容歼灭，又可稳住北平之敌，不致从海上逃掉或西窜，以增加我军日后消灭他们的困难。这是作战中战术上的策应，却是做文章中的细节，对于表现主题是何等的巧妙和不可缺少。

妙笔之六，是和平解放北平。淮海战役虽还在进行，但敌人被歼灭，我军稳操胜券，已成定局。所以北平之敌傅作义已成惊弓之鸟。傅作义60多万军队便企图由海上逃走，或西窜绥远。但没等傅作义惊魂稍定，毛泽东便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与华北聂荣臻兵团配合，以神速的动作，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地区，使敌人

既不能从海上逃走，又不能西窜绥远，完全处于收不拢、逃不掉的绝境。在完成这一战役包围之前，甚至被困于张家口、新保安之敌，以及杨罗耿兵团所包围的敌3个师，都不先行消灭。淮海战场，也暂缓歼灭杜聿明残部。待我从容布阵完毕，再逐一歼灭。

1948年12月22日，围歼新保安之敌；24日攻歼张家口之敌；1949年1月14日，攻歼天津之敌，活捉顽抗的陈长捷。至此，华北之敌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斩头去尾，分段歼灭，遂使北平20万守军被团团围住，陷于毛泽东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便率部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北平遂和平解放。

毛泽东象一位艺术高超的设计师，成竹在胸，精密设计，彼此呼应，左右逢源，真达到妙不可言的境界。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战略决战这篇雄文基本作成，不过还有两个插曲也非常精彩，很值得一提。

一是，当辽沈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我军得到消息，说傅作义的部队已经从北平、保定出发南进，扬言要夺回早已被我军解放的石家庄市，并妄图偷袭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西柏坡。而我军在北平至石家庄之间，又无主力部署，所以情势十分危急。因而周恩来副主席作了如下部署：西柏坡的警卫部队，加紧训练刺杀投弹，准备迎击敌人。若敌人敢于进犯，便坚决抵抗，掩护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转移，中央机关也做好了转移准备，当地农民也加紧秋收秋种、藏粮，准备转移。

毛泽东为了从精神上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便于1948年10月31日，亲自写了一篇新华社社评，公开警告敌人：我们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你来对你没好处，你还是老实一点好。社评中还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你们究竟还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这样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〇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几个兵了；总之蒋介石的整个北方战线，傅作义的整个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还在那里做什么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在赞扬丁玲的一首词中曾说：“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用的不是纤笔，而是如橡巨笔，又顶多少精兵呢？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大概就难以计算了吧。

社评一播，果真灵验。敌人象《空城计》里的司马懿一样，退兵了，而且很快，也算得上“兵贵神速”，他们逃回保定、北平等地。不久，保定敌军也龟缩到北平。

瞧，一枝多么名副其实的力敌千军万马的妙笔！

二是，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天津又获得解放，傅作义的20万大军，便处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真是有通天神通，也插翅难飞。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与我党派遣的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举行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但在和谈条件尚未全部执行的时候，傅作义将军却请求要亲自拜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首长。

在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同意之后，傅作义和邓宝珊将军便飞抵石家庄，受到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迎接，并陪同乘吉普到达西柏坡，受到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周恩来肯定了傅作义的爱国行动，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是位爱国将领，并勉励他继续与我党合作；欢迎他参加后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使傅作义极为感动。

接着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

接见时，傅作义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第一句便说：“我有罪！”毛泽东却赞扬他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还勉励他说：你是功大于过。和平解决北平最好，你带了好头，立了个大功。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还勉励他将来当个水利部长，更好地发挥作用。还给他讲了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傅作义极为激动，表示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把工作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

他是孤疑而来，感激而去。

以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得到完全、顺利地执行，还协助我党和平解放了绥远；直到解放之后，他任许多要职，如水利部长、国防委员等等，为建设祖国，全心全意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看，毛泽东把这篇妙文做得处处伏笔，处处照应，承转关锁，浑然一体，多么细致入微，天衣无缝，绝妙之至！

总之，战略决战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先后消灭了蒋介石的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使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完全暴露在我军威胁之下，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

正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决战，使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得到充分发挥，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既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军事艺术，又使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得以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成毛泽东自己独特的军事科学体系，及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他在战略决战里，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非凡的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对中国、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写作战略大决战这篇超世脱俗的妙文过程中，胸怀全局，周密布阵，此呼彼应，环环相扣。三大战役，各具特色。真可谓妙思泉涌，奔超笔下，处处生花，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超笔惊天地，落墨注鬼神”，中外古今军史上，经过如此多，如此复杂，规模如此大的战斗，其指挥艺术发挥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其军事理论具有如此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又具有如此的世界普遍性，毛泽东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淮海战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智力角逐

1948年12月，我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已近帷幕垂下之际。淮河以北，除杜聿明部据守的水城东北一小块据点外，其余全部解放。

为了实现毛主席“全部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北岸，不让敌人逃过长江”的指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将军，于12月16日请示毛泽东主席，建议立即对尚在包围之中的杜聿明所部发起总攻。

“釜中之鱼”，啥时想吃啥时吃

驻在河北西柏坡中央总部的毛泽东主席，虽身居帷幄之内，但全国各战场的敌我态势却全然装在胸中。接到电报以后，即以军事家的头脑，审时度势，迅速权衡了战场全局双方的利弊关系，复电指示：

“从即日起，两个星期内对包围的杜聿明匪部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当即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召开了总前委会议，令淮海前线各部队，从12月16日起，停止对被围的杜聿明所部的进攻，改为大规模的政治劝降运动。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发表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之后，又向邓小平书记、刘伯承、陈毅司令员发电指示：

“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应休息到1月5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

杜聿明部被围后尚存的20万人马，既然已经到了孤立无援，山穷水尽的地步，劝降等待十天八日足矣！何以要待20天之多到1月5日再行进攻呢？原来，这是毛主席对全国解放战争进程作了精确的计

算之后，采取的一条“缓兵之计”。这条“缓兵之计”，就是要在淮海战场造成一种缓和的态势，使蒋介石产生解放军只能包围而不能吃掉杜聿明的错觉，从而对于北平、天津北线60万蒋傅军的南撤，定不下决心，以便东北解放军利用这一段时间，出敌不意，入关占领塘沽和新保安，切断华北60万傅作义军队的东、西逃路，完成对华北蒋傅军的战略包围。倘若华北战场的战略包围尚未完成，就把杜聿明所部全部歼灭，很可能吓得蒋介石迅速南逃，将其平津所辖24个师由塘沽南逃宁、沪；吓走傅作义的20个师西窜绥远老巢。那样一来，要想一举歼灭60万蒋傅军困难就多了。

“诱饵”被蒋介石咬住了

南京总统府内。蒋介石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躁不安。他指挥过多年的战争，但每当同毛泽东搞起智力上的角逐，总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淮海战役从11月7日开始，到12月中旬，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其间在第一、二阶段的战斗中，蒋军已经损失了40多万人，这使蒋介石痛心不已。他深感情势严重，曾想放弃华北，撤退平津60万蒋傅军南下过江，守备江防，以逸待劳，寻找机会再起。但由于蒋傅内部的种种矛盾，导致了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各自都坚持保护自己的利益范围，致南下难以成行；再加上我淮海前线与华北战场兄弟部队采取了“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南北两线互为呼应，推迟攻击，一种“缓和”局面呈现在蒋介石面前。这实际上对蒋介石起了“定心丸”的作用。在解放军停止攻击杜聿明

集团的20天中，他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心理矛盾重重。他既欲求保险撤至江南，又舍不得扔下长江以北的既得战略要地。“缓和”局面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和幻想。他觉得解放军在力量上暂时还吃不掉杜聿明，淮海和华北的局势还可撑持一个阶段。因此，他不肯轻易定下海运平津守军南下的决心。在进行兵力部署时，他把主力尽量集中在北平、天津，将华北60万人马，撤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500公里的战线上，形成了一个固守点线的一字长蛇阵。

蒋介石终于毫不走样地进入了毛泽东设下的圈套，完成了一个等待灭亡的战略部署，这使蒋军彻底失败的进程大大地缩短了。

杜聿明集团的覆灭

1949年元旦，白绒绒的雪花漫天飞舞。淮海战场，天气格外寒冷。

十多平方公里的包围圈内，拥挤着杜聿明部的20万人马。在那里，一切可以吃的、烧的都不存在了，没有树木，没有五谷，粮食吃光了，骡马吃光了，横七竖八的尸体身上的肉也被剥下了……饥饿和寒冷，鞭打着包围圈里的敌人。

我军前沿阵地，完全是另一种情景，将士们个个兴高采烈，战斗意志倍增，人们的情绪非常活跃，祝贺声、欢笑声、掌声不停地空中飘荡，战地呈现着一片佳节景象。

早在淮海前线停止进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毛

主席督令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不待休整，立即南下入关。为了隐蔽企图，毛主席命令关部队不走山海关而绕道承德、古北口，抓紧战机，突然完成对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守军之战略包围。

12月下旬，当蒋介石发觉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60万军队，已被东北、华北野战军分割包围在平津一线时，再想南逃，已为时过晚了。战场上的一切发展变化，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思维过程进行的。

到了1月5日，解放军南线淮海战场配合北线平津战场的任务已圆满完成。于是，毛主席命令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对拒绝投降的蒋军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

1月6日15时30分。炮声如巨雷震响，万道火光齐向敌军阵地飞去，杜聿明部在炮声中全部乱营。16时，指挥部发出了总攻信号，突击部队犹如锋利的钢刀，立即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插入了敌人阵地。当日即歼敌约十个团。接着，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向杜聿明残部的腹心阵地发展。激战至10日上午10时，仅用九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就摧毁了杜聿明所部成千上万个地堡、散兵坑及蛛网式的壕沟，攻占大小九十多个村镇据点，全歼杜聿明总部及其所属两个兵团。到此时，整个淮海战役遂告结束。

淮海的胜利，使我华北、中原和华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它的胜利连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继续盘据中国大陆的信心，为我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礎。

彭德怀忆出兵朝鲜内情

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后，4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留。当日午后4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

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出强大呢？为了鼓励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是把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

第一次战役

1950年10月18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19日晨到拉古哨电站，20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21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脚跟。25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速退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第二次战役

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在离敌进攻出发点30公里左右，隐蔽构筑反击阵地。11月中旬×日，麦克阿瑟坐飞机侦察，其总部又对所属广播：“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我军判断敌即将进攻，一切准备就绪。11月20日前后，敌向我猛烈进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战。以小部队节节抗击，

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前沿，时近黄昏，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天疲劳之时，以小部插入敌军后方，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人翻马倒，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也是出敌不意，是我争取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正确战术方针，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

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第三次战役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至12月中旬，我已隐蔽接近三八线。经过严密侦察，作好各种攻击准备，乘1951年元旦前夕（1950年12月31日晚），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

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之新生兵力，共约四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咸镜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30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

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3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这时，我已有3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接近三七线；主力位于汉江以北三八线及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构筑工事，以防敌反攻，并准备长期作战。

第四次战役

我军进至三七线（水原一线），即行停止攻击。敌见诱我深入洛东江预设坚固阵地不成，于1月下旬举行反攻，我集结五个军举行迎击。此役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伪军，小部分是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约两千人左右；美军只有一个多营。但把敌

反攻打退了。1951年二三月间利用短暂的几天时间（来回7天）回到北京，向主席报告了朝鲜战况和请示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须在2月15日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之五十军，撤回北岸。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第五次战役

敌积极诱我军深入洛东江失败后，于2月中旬大举向北进攻。我采取节节抗击，艰苦战斗，经过约40天，敌推进到三八线。我在西线举行反攻，把敌打回汉城附近。这是二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但敌不再放弃议城了，在东线进至三八线，敌亦不撤退，向汉城摆成梯队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共同组织力量将东线之敌打退。有一个军进得远（接近三七线），接济不上，粮食异常困难，撤回时很疲劳；还有六十军的一个师，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机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损失3000人。这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全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次损失。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救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一般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日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在这时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这个办法很好，但须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就无法去敲别人。由第四次到第五次战役结束，经两月多的激烈战斗，敌军也就相当疲劳了；我军阵地已开始形成，并

逐渐巩固起来，地面防御战转变为地下固守防御战。在作战形式上，我方进一步构筑坑道纵深工事，沿着“三八”线逐步完成。坑道工事的加强，敌攻不破我阵地，（上甘岭阵地的出现即是一例）使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均被挫败。我集中兵力可以有选择、有准备地攻破敌阵地，学会了既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进行防御战，又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进攻战。构筑稳固的阵地战，在1951年夏秋出现了，对敌军进行主席指示的“敲牛皮糖”战术开始了。即集中最大限度的火力、兵力，做好隐蔽进攻阵地，每次歼灭敌一部，大多是敌一个营。打了不少这样的歼灭仗，每月大概打四五次，集中起来就不少了，而且真正学会了阵地攻坚战。最后一次阵地突破战，是停战前一夜（1953年2月下旬某夜），我方以四个军一夜突破敌人25公里宽和深的坑道工事体系，消灭伪军四个师大部，美军一个重炮团。我们打出了这样一套阵地积极防御的新战术，即劣势装备的我军，进攻敌阵地时，能攻得破；防御时，能守得住；能攻能守，掌握战场主动。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战胜利，迫使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克拉克和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丰富的。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下的后方勤务工作，其经验也是宝贵的。在反细菌战中，也取得了不少经验。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兄弟般地相互支持。在三年的共同斗争当中，我军与朝鲜人民及朝鲜人民军之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战斗友谊更加巩固了，国际主义的感情是更加深厚了。

许世友是如何打出少林寺的

许世友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原名许仕友，革命了，他认为“仕”字有“出官

纳仕”之嫌，与他要为穷人打天下的宗旨格格不入，于是，便在入红四军时改名为“士友”。后来，毛主

席任命他当军长时，提议他改名为“世友”。

少年时，他去少林寺学得一身武艺。有书描绘他“膀大腰圆，臂力过人，两条腿立在地上像两根顶梁柱子，浑身的肉疙瘩露出来，像一块硬梆梆的小石头。碗口粗的杉树，他可以一气儿劈断好几棵。12个铜板摞在一起，他一刀劈下去，铜板分成24片。他指似钢叉，叉人一下，能捅出五个血洞；抓人一把，能扒下一块皮肉。他又身轻如燕，五六米宽的壕沟，一跃而过。一丈多高的房屋，纵身凌空，片瓦不碎……。”对这些夸张的说法，他自己说：“飞檐走壁不敢说，功夫嘛，有一点。”于是，他抱起碌碡举过头顶，让战士们开开眼。

少林寺本来有一条颇为稀罕的寺规，凡有出师弟子欲投他处，或有返俗还乡的，都必须由大门而进，由后门而出，须闯重重险关。那些误入佛门，不安于清心寡欲、坐禅习武的人，那些不安于苦行僧、想冲破牢笼的人，都因惧怕这后门闯关，也只好老死古刹，万念俱灭了。许世友又是如何逃出来的呢？

在苦行8年之后，他思母心切，决心打出少林寺。少林寺之主妙兴老禅师站立在门前的台阶上说：“今有一不肖之徒，不安心坐禅习武，返俗还乡，要打出寺院。徒儿们，快分四门摆下阵势，决不放掉这个不肖之徒！”老禅师一声令下，100多名师兄师弟，分一门、二门、三门、后门依次列队摆开，各门相距百十米远。据传，连闯四门打出去的和尚，自少林寺兴武以来，也不过寥寥数人。

许世友回到东和院，收拾了一个小包行装，紧挎在背后拴牢，俯身从床下取出了哨棒。拎了八年的哨棒啊！浸透了他多少汗水和心血！今日全靠你了！他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沫，直奔一门而来。

一门的10位和尚，手持棍棒列队于门后，见许世友过来，便齐声喊：“打！”挡住去路。许世友心想：难道这棍棒之下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吗？是闯还是退？硬闯就有死的危险，家有老母，儿先亡之为不孝；可是退回去即便老死在寺院，也不得见母一面。“打就打吧！”许世友把心一横，紧握手中的棍棒，一个跃步，拨飞了第一个和尚手中的哨棒。霎时间，一门响起了劈啪作响的舞棍声，似炮竹，如闪电。许世友左挡右挑，右挡左拨，眨眼的功夫，安然出了一门。

许世友知道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他紧了紧腰带，昂首阔步地走向二门。他持哨棒轻轻一挑，就越过三僧的棍棒。四马猿出栏，他灵机一动，从两个马肚底下滚过，继而又跃过了两马猿的背部，来到了门前居高临下的石阶上。接着，他又一个鹞子翻身，越过了5个和尚的拦阻，翻滚到一条狭窄的辅砖

甬道上。

“快打！”“快打！”师父有言在先，决不放过他。众僧们齐声呐喊。

许世友面对众僧的挑战，心不跳手不软，从地上“腾”地跃起，拿住一根三尺有余的护身短棍舞将起来，勇猛当先。许世友拚命冲杀，翻滚跳跃，犹如一阵旋风在棍棒林中驰过，紧接着他战胜了四马猿，打出了二门。

这时，许世友已经大汗淋漓，气喘粗气了。在两道门和三道门中间，他潜在一颗古松背后稍稍喘息了一会儿，他决心要用心计闯过第三道门。

许世友突然从树后跃出，如猛虎下山，众僧目瞪口呆。没容40位僧人举棒，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过了第三门。

眼下只剩最后一关了，也是最难过的一关。许世友大声吼道：“我来也！”

排头的几个和尚齐声喊道：“开打！开打！决手软！”一齐挥舞着哨棒向他打来。许世友一时兴起，手中的哨棒抡得呼呼生风，动作自如，真有万夫难当之勇。他的哨棒所及之处，如风卷残云，刀劈梅花。只见一个个和尚惨叫倒地。陡然间，许世友手中的哨棒打折了，身子挨了一棒。他急中生智，拣起断棒，两棒齐舞，全身之力凝于棒尖。他很快打入80位和尚之中。这里统称为“密人防”。

说来也颇为稀奇，一人敌众，关关皆破。多少师兄师弟，往日在他看来，都是难以取胜的对手！可是今天，他们手中的棍棒，轻轻一挑，便飞上天，有几个愣和尚看呆了，只顾喝彩，竟忘了抡棍阻拦。

许世友打到门口，心想：这里有36个木机人拦道，不可大意。正想间，一个铁弹丸似箭头般地飞射过来。许世友眼疾手快，用棒一挑，“咔”地一声，击掉了手中的半截哨棒。这时，只觉着背后一阵狂风作响，许世友知道不好，头稍一偏，弹丸贴耳根飞过。

眼看就要闯过最后一道关了，只见门口处站着一位黑脸和尚。许世友一看竟是一寺之主妙兴，今天他也破例上阵。这位老禅师善使棍棒，武功极深，曾是少林寺院的“七节棍”棒王。许世友终于战胜了妙兴禅师，奇迹般地打出了院门。

许世友抬头向他栖身的8年的少林寺望去，收入他眼帘的情景却叫人心潮翻涌：全寺院的百十位师兄师弟和师父们，高高低低，黑压压地拥出了后院，并簇拥着身材魁梧的妙兴师父，缓缓地向他走来。刚刚他们眼睛里那种冷冰冰的目光，现在已经变成了亲热和善，恋恋不舍。老禅师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一个身材短粗，貌不惊人的弟子，8年里竟练出

了这般好的功夫，实在令他赞叹。老禅师的动情，也许是因为许世友这个年仅10岁的弟子，竟为师父的一片孝心，不顾危险，死里逃生。妙兴在众人的簇

拥下，来到许世友的面前，许世友急忙叫徒弟一行老禅师从袖中取出10块大洋，说：“拿去，作为路上盘缠用吧！”

中国的核弹火箭之父……

“钱学森是中国人的骄傲！”

“钱学森是中国人的骄傲！”一位中国要员这样说，而钱学森本人，欲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国际理工界的最高荣誉

1989年8月7日。

北京中南海紫光阁。

在庄重热烈的气氛中，江泽民和李鹏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祝贺他获得一项新的国际荣誉——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

“小罗克韦尔奖章”是国际理工界的最高奖章，每年至多授予三位在国际理工界有过重大贡献并声望卓著的人士。同时获得的“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则是现代理工界所能入选的最高荣誉等级，至今仅有16人获得此荣誉，而钱学森，是当中唯一的中国学者。

授予钱学森奖章与称号的事，是在1989年6月29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上进行的，目的是为了表彰他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代表钱学森到会领了奖。

钱学森在50年代中最先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建立与发展上书中共中央；在中央积极赞同并支持他的建议后，又提出了重要实施方案。从中国火箭导弹事业开创之始，他便担任这一领域研制试验的领导职务，并且从未间断，起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可以说，假若没有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肯定不会那么快那么顺利。

钱学森远将控制论发展成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并提炼成为系统工程理论，推广应用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包括人体科学）的各个领域，对促进中国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

难以估量的贡献。

一切为了中国

钱学森是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出生于上海，现年80岁。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完成了中等学业，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早在中学时代，钱学森就立定了要为中国富强发奋学习的志向。他读书非常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当时北师大附中的课程很多。在高中课程中，有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等。由于他天资聪颖和肯下功夫，这样多的课业并不使他感到有太大压力。他自己选择学了无机化学、工业化学、非欧几里德几何和伦理学。外语修了两门，除了英语，还有德语。

钱学森在回忆起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时，感慨地说：“在我一生所受的教育中，北京师大附中教育是至今怀念的非常好的教育。这样多的课程，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同学也没有感到压力很大。下午下了课，还非要玩一阵才回家的。”

由于中学的学习程度高，他的成绩又好，进了大学，开始就比较轻松。但钱学森仍十分用功，门门成绩都95分以上。一册《分析化学》，他能从第一页背诵到最后一页。

1935年，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考取了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次年，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考获硕士学位。后又到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深造，受业于美国航天科学创始人之一、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的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门下，1939年获航空与数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这期间，钱学森如饥似渴地研究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三年后，他站到了当

代学术界的现代数学与力学的最前列。后又研究航空结构，仅用了一年时间，便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冯·卡门非常赏识钱学森

冯·卡门是匈牙利人，1934年定居美国。他非常赏识这个才气横溢的中国学生，认为钱学森富有想象力，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数学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物理图像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

卡门经常与钱学森一同攻克数学难题。钱学森经常提炼卡门的某些思想，使一些难深的命题变得简明扼要、豁然开朗。钱学森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高超声速流概念。高亚声速飞机采用的公式，就是以“卡门——钱公式”命名的。这个公式第一次发现了在可压缩的气流中机翼在亚音速飞行时的压强与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这是空气动力学中的重大成果。在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写出了有关高速空气力学方面的博士论文，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

1943年，美国军方委托钱学森研究 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导弹

在卡门的影响下，钱学森对火箭技术发生了兴趣。他参加了由卡门领导的古根海姆实验室，成为该室火箭研究小组最早三人成员之一。钱学森开始研究火箭发动机。由于他的研究，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

1943年，美国军方经过慎重选择，委托钱学森研究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导弹这一课题。这年11月，他与马林纳合作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出三种火箭研究设想，受到美国军方的高度重视。这份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研制成功的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成为美国复合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

1947年，经冯·卡门推荐，当时年仅37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终身教授。两年后，1949年，他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课程和“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领导人。钱学森开始研究核发动机，写出了第一篇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

40年代时，已是举世公认的力学、应用数学 和火箭发明技术权威，现代航天技术权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军方高度赞扬钱学森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钱学森被认为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这时，钱学森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力学、应用数学和火箭技术权威，流体力学开路人之一，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航天技术的先驱，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

美国丰厚的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 没有留得住钱学森回归的心

辉煌的成就，崇高的声誉，带来了十分丰厚的生活待遇和得心应手的科研条件。然而，正如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属于祖国的。钱学森也一样，他对祖国魂牵梦绕，思念之情与日俱增。他不止一次地梦见故国故土，梦见学生时代的老师同学，梦见亲人和伴他度过童年的屋子。他始终没有忘却有朝一日报效祖国。

在35年之后，钱学森回忆道：“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留下来。”

在当时的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后，多数会将他的收入的一部份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养老。然而，钱学森连一块美元也没有存。有些人觉得很奇怪。钱学森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47年与蒋英在上海结婚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中国。他的女友蒋英适从德国学成归来。蒋英是中国著名的军事战略家、教育家、清末著名刊物《浙江潮》的创刊人之一蒋方震（蒋百里）的三女儿。钱学森之父钱均夫与蒋方震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系同窗好友，两家过从甚密。这位已经成为著名歌唱家的女友，终于与钱学森结为伉俪。他们是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婚后，钱学森原准备留在国内，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但是，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黑暗，使他大失所望。然而，他也在失望中见到了希望。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如日方中，节节胜利，受到老百姓拥戴。他决定与蒋英重返美国，准备日后为中国效力。

回到美国后，人们发现钱学森变了。他接待来客更少，工作更加埋头，研究更加勤奋。他悄悄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无论在那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1949年仲秋之夜，月圆夜静。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门对面的街心花园里，庄逢干、罗佩霖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围坐在钱学森周围共度中国传统中秋佳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们怀念故国，传递着新中国诞生的讯息，一个个归心似箭。当夜，他们悄悄地商议了回国的计划。

万没有想到，为了回归中国，钱学森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整整五年多时间的折磨。

钱学森决心回国的愿望激怒了美国当局。他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美国军事当局吊销了他参与机密研究的证件。

历尽万千风险，经受五年折磨

1950年7月，钱学森愤而到华盛顿找主管他的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正式提出回国的要求。当时，中美敌对，朝鲜战场战火正浓。金波尔对钱学森的归国要求既震惊又害怕。“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他说。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一家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这时，他已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买好了飞机票，准备搭乘加拿大航班离美回国。然而，他一下飞机，便接到了联邦移民局的通知，不准离开美国。还以判刑和罚款相恐吓。

行李遭搜查，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被扣押

这时，他的行李和书籍、笔记本已装箱准备由“威尔逊总统”号客轮转送香港回国。但是，已装上驳船的行李受到了非法搜查，800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押，并硬说他企图运送机密科研材料回国，诬陷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从此，钱学森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他的家和工作室也受到了搜查。

1950年9月9日，钱学森竟被当局逮捕，关押在特米那岛上达半个月之久。关押期间，看守人员为了折磨他，晚上每隔10分钟便跑进室内开亮一次电灯，使他终夜无法入眠。

当时他的导师冯·卡门还在欧洲。得悉情况后，他与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师生立即向移民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杜布里奇院长还亲往华盛顿要求释放。为了营救钱学森，他们还募集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

钱学森终于被开释。但他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他的体重下降了30磅。

释放后的钱学森，实际上继续受到监视。他在压迫下渡过了整整5年变相的软禁生活。联邦调查局时常闯入他的住宅捣乱。他的信件和电话也都受到了检查。

无论是金钱、地位、美誉和舒适的生活，还是威协、恐吓、歧视和折磨，都消蚀不掉钱学森回归中国献身的心志。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数惊，为此经常搬家。但不管如何，心志不变，他的夫人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了三只轻便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

在这段时间，为了及时了解中国的发展，慰藉自己那颗对故国思念的心，他经常阅读《大公报》、《华侨日报》等报纸。

1954年，写下三十万字的《工程控制论》

1954年，钱学森写了洋洋30万言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他说：“那是写给美国当局看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自己已改变了科研方向，以便尽快获准回国。此书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又先后出了俄文、德文、中文版。从此，钱学森确立了在工程控制论领域创始人的地位。他当时43岁。

这期间，中国也一直切望着他归来，并且没有停止过努力。然而，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中美双方还是敌对国家，直到1954年日内瓦开始中美大使级谈判，两国才进行了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

1955年6月，钱学森在家书中夹带了给亲友陈叔通（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信，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实现回国的愿望。陈叔通将信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重视。

在1955年8月2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王炳南受周恩来的嘱托，在会上代表中国政府揭露美国当局的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中国公民

钱学森以阻挠他回国的行为。

美方不得已，被迫于1955年8月4日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

冯·卡门得知钱学森回国的消息，深表惋惜地说：“无论如何，美国实际上并无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把美国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人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交还给了红色中国！”

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押送回国

当然，说“奉送”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钱学森是被驱逐出境的。钱学森回忆道：“我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押送回国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为一下船，美国政府对我的安全就不负责任了。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

“祖国啊，我终于回来了！”

1955年10月28日上午，阳光明媚。北京天安门广场鲜花盛开，一片热烈，钱学森回来了！

昨日刚从波兰华沙转道回国的钱学森，不顾涉洋过洲的劳顿，带着妻子蒋英和一儿一女，来到金水桥畔。

“啊！我终于回来了！”他满怀激情地说。“我相信，我是一定能回来的。”

游子终于投入了母亲的怀抱。而这是经历了千难万劫才获得的。钱学森的激动真是难以言表。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他表示了格外的珍视与厚爱。

周恩来高兴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未获积极成果，但从要回钱学森这件事看，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周恩来把钱学森接到中南海

周恩来派人把钱学森接到中南海，专门为他设宴洗尘。他要钱学森先到各地走走看看，熟悉熟悉祖国的情况，并要他对国家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

陈赓大将专程到哈军工接待钱学森

哈尔滨，是钱学森到各地去的第一站。这里有一座当时建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专门培养军事科技人才的，钱学森决定到那里去参观。

担任院长的是军委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听闻

钱学森要到哈军工参观，特地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待他。

陈赓知道钱学森是搞导弹的，“中国搞导弹行不行？”他问钱学森。

钱学森知道中国的领导人有此考虑，感到十分欣喜，便充满信心地答道：“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1955年12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钱学森搞火箭导弹的报告

就在这年的12月，在北京中南海小礼堂，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听取了钱学森关于火箭导弹技术的介绍。

毛泽东嘱托钱学森培养青年科学家

接着，毛泽东再度两次接见他。

第一次是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泽东对他说：“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毛主席勉励钱学森要致力于国家的建设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以后，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嘱托，为培养扶植科技人才付出了很大心血。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他时，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作出了论述。

中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

钱学森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国家12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高见卓识。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根本变化”，“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落后的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归国才三个多月的钱学森，怀着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和盼望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愿望，给中央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为保密，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代替

今天所说的航天技术)，对发展中国火箭导弹技术提出了规划设想。

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中央高度重视。

1956年4月的一天，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一次由中国最高军事负责人参加的军委会议在军方总参谋部召开。

周恩来亲自宣布请钱学森谈谈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

钱学森的设想引起了到会元帅和高级将领的极大兴趣。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当即表示赞同和支持。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正式作出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

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便与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

中国第一任导弹研究院院长

1956年的中国，国力是很贫弱的。但是，在世界上，强国并不因为你弱而不打你，相反，越是贫弱落后就越要挨打。

钱学森深知这一点。当然，他也深知要在中国这样一片落后的土地上建起现代尖端科技的大厦多么不易。但是，高层主管的信任和配合，全国的殷切期望，在他心中激发起高昂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一种为祖国强大而努力奋发的决心、勇气与信心在钱学森身上油然而生。

1956年10月8日，当聂荣臻副总理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院正式成立时，钱学森接受了院长职务的任命。

尽管国家处处给新成立的五院开绿灯，困难还是接踵而至。没有人，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图纸资料，一切都得从头搞起，连院址也得现选现定。虽然从各有关部门抽调了30多名技术专家，接收了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应届毕业生，但谁也不懂导弹，连导弹是什么模样也没有人见过。

钱学森那段时间真是忙坏了。他从研制规划、技术决策到人员配备、研究室的设置、仪器设备的添置、研究课题的确定，乃至院址的选定，样样都得亲自过问。更为繁重的是还要讲课，开办研究班，培训技术人员。他想得十分全面而且细致，因为现有的人员中都不懂导弹，他生怕把事情搞坏了。

一些当年的科技人士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钱院长带着我们去选看院址；

钱院长每天一上班，就到每个研究室去一一询

问每个研究员：你有什么问题吗？可是那时大家几乎一问不通，连问题也提不出来；

每星期天下午，钱院长还要把我们几个主要专家找到他家里，上小课，讨论问题；……

但是，钱学森没有三头六臂。他会累坏的。更严重的是，这里潜藏着一种危险：应接不暇的院长，可能会在繁忙中疏漏了真正只有他才决定得了的大事。

然而能怪谁呢？那时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包括钱学森自己。

这个问题很快便被察觉并纠正了。组织人事作了新的调整安排，使钱学森得以很快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集中精力考虑科技决策的大事和技术工程中的难题。

在以后的日子里，始终担任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最主要技术领导的钱学森，虽然并不具体抓每一个技术工程，但每个技术工程里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与智慧；人们虽然不能经常见到他，但处处可以感知他的存在。

当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时，是以钱学森为首并由他带领的中国自己的专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在很短时间内研制出中国第一枚导弹。

当中国中程导弹的研制遇到难题、遭受挫折时，是钱学森深入第一线指导帮助，与大家集思广益，戮力攻关，不仅使中国的中型导弹技术，而且使整个火箭导弹技术走上了更为扎实稳健的发展道路。

当原子弹小型化工作完成时，是钱学森适时提出利用改进的中程运载火箭发射核弹头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之下，研制工作进展很快，使这一美国人用13年时间完成的技术，在中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便获得了成功。

从此，中国在上确立起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地位。

不少海外中国人都因为中国科技的飞跃发展而感到扬眉吐气。外国报刊上也表示：“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

洲际导弹、远程火箭、人造卫星、同步通讯卫星的成功，都倾注着钱学森的心血

试验成功，聂荣臻元帅拥抱着钱学森，两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向善于控制感情的周恩来，为了表示祝贺，特意把钱学森等找到他的办公室，高兴地说：“群众都